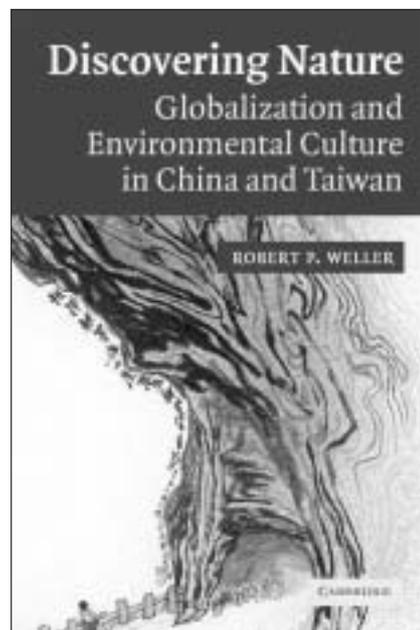


# 文化傳統與中國人的 環境意識

● 周永明

有關中國環境問題的著作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的思路：一是對中國環境危機的大聲疾呼；二是傾向於將中國的環境問題和政治制度緊密關聯。魏樂博獨開蹊徑，試圖從更深的文化觀念層面來探討中國環境問題。



Robert P. Weller, *Discovering Nature: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魏樂博 (Robert P. Weller) 教授是美國資深的人類學家和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現任教於波士頓大學。1970年代起他開始在台灣進行田野調查，着重從社會文化角度考察民

間宗教；80年代起又將研究視野延伸到中國大陸。縱觀其學術生涯，人們不難發現他對文化多樣性、農民抗爭、公民社會和權力等問題的濃厚興趣。近年來，他將研究重點轉向環境問題。《發現自然：中國和台灣的全球化和環境文化》(*Discovering Nature: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一書便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

隨着中國的高速發展，環境問題愈來愈得到西方的關注，有關中國環境問題的著作也愈來愈多。如果做一粗略的勾勒，有關著作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的思路：一種是對中國環境危機的大聲疾呼，並試圖發出世紀末般的驚人預測。布朗 (Lester R. Brown) 的《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 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 可以算是典型。這類書的作者多是環保活動家，對中國社會不一定有太多了解。他們的著作可以引起世人對中國環境問題的關注，但論證和預測常過於粗放，經不起學術推敲和事實檢驗。另一種大多出自研究中國

的學者之手，傾向於將中國的環境問題和政治制度緊密關聯，認為社會主義是造成當代中國環境危機的直接原因，代表作之一是夏竹麗 (Judith Shapiro) 的《毛對自然的戰爭》(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與眾不同的是，魏樂博獨開蹊徑，試圖從更深的文化觀念層面來探討中國環境問題。為此，他特地將政治體制相異的中國大陸和台灣進行比較研究。在兩地擁有的長期研究經歷無疑賦予他旁人所難具備的權威地位。

作者的目標很明確，即從人們理解環境的方式以及對自然的觀念來探討環境意識興起的原因和後果。令人高興的是，作者對此沒有做簡單化的處理，而是力圖展現其內在的複雜和矛盾性。如他所言，新的環境意識既源於現代性，又是對它的反應。現代性主要表現於對生產效率和理性的追求、官僚機構的擴張、社會價值的市場化等等。但在相同的社會背景中，卻產生出兩種截然相反的環境觀。一種是贊成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和索取。資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立場一致，將大壩、運河和鐵路作為人類力量和進步的象徵而加以讚頌；另一種則注重對環境的保護和珍視。面對愈益人工化的世界，許多人強調未經人類觸手的蠻荒之美，以及對想像中的田園式農村的懷舊，作為對城市和工業化生活的替代。國家公園、自然觀賞旅遊的興起和這種環境觀密不可分。

魏樂博進而指出，作為歷史事實，西方的環境觀本身就具有全球

化的特性。憑藉殖民和後殖民的種種機制，歐美的自然觀念滲透到了全球各處。但人們應注意這種觀念輸出的複雜性，就像西方都是人工圍墾和濕地保護項目的倡導者一樣。誠然，在當今世界，西方特有的對自然，對人與自然互動的思維方式，通過發展項目、非政府環保組織、教育和媒體取得了強勢地位，但以此來推定其他地區除了重複西方經驗之外別無選擇，則有失偏頗。

全球化無處不在，人們在面對它的同時又對它進行選擇和重組。對本土特殊性的肯定與全球化強調同一性的要求可以共存。作者認為日本流行動漫文化是個很好的例子，鮮明的本土特性並沒有阻礙它取得引導全球潮流的地位。從這一點出發，作者特別注重本土文化觀念對全球化文化觀念的反應和重塑，並以環境觀為例加以分析。在討論本土性時，作者也強調其內涵的複雜性。相對於全球化概念而言，本土不能簡單地作為全球化的對立面，因為最本土化的社區也因財富、性別、年齡的差別，將人置於不同的社會和權力位置中。

本書的另一個重點是探討國家權力對環境觀念的影響。隨着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有些理論家曾預言民族國家的消亡。作者顯然認為這言之過早。事實證明，民族國家在當今世界各方面仍然發揮無可替代的影響，包括對人們環境觀的構塑。台灣和中國大陸在過去半個世紀中走過了不同的經濟和政治道路，但就環境觀而言，作者發現兩地的差異並沒有人們想像中那麼

隨着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理論家曾預言民族國家的消亡。作者認為這言之過早。民族國家在當今世界各方面仍然起着無可替代的影響，包括對人們環境觀的構塑。

中國文化中的環境觀念複雜且多樣，其中最主要的思路有兩條，一是儒道都認同的天人感應觀，另一條是佛教的萬物慈悲觀。有關「氣」及「風水」的觀念，也對中國人對自然環境的理解產生很深的影響。

大。處在同一文化傳統中的兩個不同政治體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影響人們的自然觀，作者顯然選擇了一個貼切又有趣的案例。

從上面的大框架出發，作者在書中着重探討了三個影響環境問題的主題：本土文化和社會資源的當代相關性、全球性觀念的多樣複雜性，以及兩岸政權各自的特殊角色。

在第二章中，作者探討了傳統中國文化中有關人與自然的觀念。作者指出，在二十世紀初，「自然」一詞成為約定俗成的翻譯之前，漢語中並沒有和Nature完全吻合的詞，但中國卻不乏有關環境及如何與其相處的觀念。作者試圖從哲學觀念和具體實踐兩個層面，考察那些二十世紀前就已存在，迄今仍然具有影響力的中國本土環境觀念。由於它們和舶來的西方環境觀念相異，對它們的討論有助於廓清全球／本土爭論中本土的一面，而且也可以視作對觀念全球化的潛在的另項選擇。魏樂博指出英語中Nature指稱的是事物本質性的東西，是指導世界或人類內在的力量，是物質世界本身。而「自然」這一中文譯法不能凸顯Nature和Culture的對立。自啟蒙運動以來，這一對立在西方非常重要。中文裏涵蓋Nature部分含義的概念有「天」、「天地」、「山水」、「萬物」和「本性」。

作者指出，中國文化中的環境觀念複雜且多樣。其中最主要的思路有兩條，一是儒道都認同的天人感應觀。本質上它是一種人本主義，認同人類利用自然萬物，但這種利用的終極目的是在人間和上天

的宇宙秩序中建立相成的關係。另一條是佛教的萬物慈悲觀。對佛教教義而言，在本質層面上，人類相對於其他萬物沒有甚麼優越之處。轉世重生觀念將各種生命聯繫在一起。作者指出，莊子在〈庖丁解牛〉篇中，將宰牛描繪成是那樣的愉快的一件事。自佛教傳入後，中國人的閱讀感受就不可能再像原來那樣了。在這兩條主線之外，有關「氣」及「風水」的觀念，也對中國人對自然環境的理解產生很深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

魏樂博在第三章中轉向對全球化一面，尤其是二十世紀傳入中國的環境觀念的探討。他指出，雖然中國也受到早期全球化的影響（絲綢之路、佛教東傳、與阿拉伯和東南亞的貿易，以及傳教士對西方知識的傳播），但二十世紀有兩個獨特之處：一是見證了討論環境詞彙的變化，二是這種新變化通過教育系統獲得了廣泛的滲透力。現在使用的「自然」一詞，二十世紀20年代才在現代漢語中取得主流地位。

和許多其他西方概念一樣，「自然」的現代譯法轉借於日文，它試圖突出自然和文明、文化的對立。作者告誡人們，西方關於自然的觀念也是複雜的，幾種相互衝突的思潮往往並列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一是視自然為人類可利用的物體，讚賞人類征服自然獲取進步成功的能力；二是認為與人無關的自然有其自身的價值，主張自然荒野本身應該受到人類的欣賞和崇敬。第三種則用想像的田園牧歌情境來調和人與自然的關係，修正現代都市生活的種種弊端。

在五四時代，第一種自然觀被中國知識份子普遍接受。科學以其探索和改造自然的潛力，和民主一道被奉為救國的不二法則。作者引證李歐梵的研究指出，雖然崇尚自然的浪漫主義思潮對五四運動也有深刻影響，但同時代中國的知識份子似乎更注重對情感的抒發和個性的張揚，自然從來沒有佔據像在浪漫主義中那樣重要的地位，從來沒有表現出像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梭羅 (Henry D. Thoreau)，以及稍後的繆爾 (John S. Mill) 對自然和荒野的熱愛。對前者而言，城市是他們現代性觀念的核心。國家公園和田野觀光為甚麼在多年後才在臺灣和中國大陸興起，作者認為與此不無關係。

在魏樂博看來，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對第一種自然觀的接受，將自然視為人類可以通過科學認知工程 and 技術操縱的機制觀念，將自然和人的關係徹底對立。與中國傳統中認為「氣」貫穿萬物和人類比較，這種觀念將自然看得更機械和無生命力。他認為，中國現代所面臨的種種環境問題，和這種取得支配地位的自然觀存在深刻關聯。這種深層次的文化觀念比政治理念更能影響環境政策的制訂。從這個角度出發，魏樂博認為西方學術界流行將中國大陸環境問題和社會主義掛鈎的思路，只觸及了事實的表象。

如果將中國大陸和台灣連同起來加以考察，就會發現在兩岸所發生的，只不過是現代主義者 (第一種自然觀持有者) 和自然之戰的特殊表現形態而已。這種思路的源頭始於十九世紀的西方，在中國被接受

後，可以超越具體的政治觀念而發揮巨大影響力。就本質而言，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現代科學主義的信奉者，都相信「人定勝天」，相信大規模改造自然的必要。

人們現在聚焦於中國大陸在1949年後發生的由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而帶來的種種環境災難，實際上與國民黨在思路上並無兩樣。在1949年之前，國民黨不是沒有雄心，而是缺乏資源、心有餘而力不足。到台灣之後，隨着政治控制的強化和財政狀況的好轉，國民黨發起了一場快速工業化的運動。現在人們經常講它是一個經濟奇迹，但事實上也是一場環境災難。人們不應光從政治層面，還應從文化層面來看待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环境歷史，這樣得出的結論才會更全面。

在餘下的章節中，魏樂博試圖通過考察具體的當代案例來顯示以上觀念是如何發揮實際影響的。在第四章，作者討論了自然觀光旅遊在兩岸的起源和發展，以及在設立國家公園體系時參照的不同國際模式。以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為例，台灣的國家公園體系是模仿美國建立起來的，強調自然的獨立性，盡量減少人類活動的影響。在美國，這種獨立性是通過遷徙公園裏的居民 (常常是土著印第安人) 而達到的，建立公園的目的是供人們觀賞，並不鼓勵人們和自然有積極的互動關係 (一般禁止野炊、游泳等活動)。台灣有些國家公園內有許多居民，要進行大規模遷徙並不現實，但在偏遠的地區，美國理念的影響還是很明顯。然而有趣的是，台灣省一級的保護地卻是模仿

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將自然視為人類可以通過科學認知工程和技術操縱的機制觀念，將自然和人的關係徹底對立。中國現代所面臨的種種環境問題和這種主導性的自然觀存在深刻關聯。

雖然本土和全球化的環境觀碰撞、交融的形式多種多樣，但兩岸展現出的相似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兩岸共享同一個文化傳統，二是雙方的決策者都體現了全球化環境觀的影響。

日本模式建立的，其中可以允許更多的人為活動，這顯然和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有關。

而在中國大陸，自然保護區體系則更多地建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模式上。聯合國的模式注重兼顧自然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關係。它將自然保護區分為核心、緩衝和外圍三個區域，允許人類在不妨礙保護的前提下，在後兩個區域裏居住和活動。中國大陸在建立保護區時正逢聯合國模式影響日益擴大，可見採用這一模式也有歷史因緣。

雖然兩岸採用的模式不同，但魏樂博發現除了設立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等政府層面的措施迥異外，自然觀光旅遊在兩岸的發展卻出乎意料地相似。在這點上，全球化和本土的因素共同作用，讓它成為一種混合體。比如，由於宗教寺廟大多坐落於風光秀麗之處，兩岸的自然觀光旅遊與宗教聖地的朝拜緊密相連。而現在市場經濟的壓力又常常使得宗教場所失去原有的意蘊。在魏樂博的眼裏，今天的峨眉山早已失去了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光環，變得更像某種宗教主題公園。在中國人心中，自然永遠應該和人有某種關係，哪怕一石一樹，也可能因具備特殊的「氣」而擁有特異功能。雖然本土和全球化的環境觀碰撞、交融的形式多種多樣，但兩岸展現出的相似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兩岸共享同一個文化傳統，二是雙方的決策者都體現了全球化環境觀的影響。

在第五和第六章中，作者引用了大量例子進一步說明環境政治在

兩岸的相似和差異。魏樂博認為，台灣對環境和自然意識的覺醒始於80年代中，相較中國大陸早了十年。第五章着重分析環境運動和抗爭。作者發現，雖然兩岸政情不同，在環境觀念和行動方式上，卻都存在一般民眾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分歧，兩岸同時深受外來的影響。魏樂博敏銳地觀察到，具體的環保抗爭的關注點，往往和國際或國家級的環保組織所樂道的全球普世化的環境主義迥異。不論在中國大陸還是台灣，抗爭總是具有地方性和圍繞民生這一中心。抗爭的議題往往是如何處理垃圾、保持水源清潔，或獲得合理補償等等。通常意義上的環保主義關注(臭氧層的破壞、森林消失、核廢料污染、全球氣候變化等等)和當地民眾目標不一定重合，環保人士沒有資格以民眾的利益代言人自居。

作者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在台灣，由垃圾處理場引發的環境抗爭，捲入者常常包括地方政治派別、寺廟宗教組織，甚至地下幫派。寺廟參與環境抗爭是台灣的一大特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環保運動不一樣。台北以知識精英為主體的環境主義者注意的中心是保護自然，而不是實實在在的民生，更談不上對寺廟和其他地方組織的參與持積極態度。由於政治環境不同，環境抗爭在中國大陸無論在規模和組織程度都無法和台灣比較。但抗爭個案增多這一事實讓魏樂博相信，一方面顯示民眾環境意識的增強，另一方面也顯示民眾參與環境政治(至少在地方層面)的空間近年來有所擴大。

作者在第五章中還對非政府環保組織在兩岸的發展演化做了一個簡略的歷史勾勒。儘管這些組織在引進傳播當代環境主義上功不可沒，但魏樂博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對一般民眾環境觀的影響依然巨大。從這一視角出發，兩岸環境抗爭中對民生和地方利益的關注就不難理解了。

在第六章，作者轉而討論環境政策的貫徹。魏樂博指出，中國和台灣一方面因環境污染，一方面因國際壓力，近來都制訂政策以圖保護環境，但兩地都存在政策和貫徹脫節的問題。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源於政策制訂者和受用者對自然的不同理解。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環保法律條例在地方一級往往得不到貫徹，原因在於地方和中央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而這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根本就不是新鮮事。這就要求人們在檢討環境政策時，應注意權力在各級行政鏈條中的具體運作方式，認識到不同權力的相爭提供了各方操縱法律條例的機會。

作者最後總結道，兩岸政治制度迥異，在對自然和環境的取態的相似之處，歸根結底源於共同的文化和歷史，其次是他們都受到了全球環境主義的影響，第三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執政機制的相似之處。更深層的原因是，他們都是人類征服自然觀念的篤信者。魏樂博在書尾提出了如何理解全球化，如何理解環境主義的多元性的理論問題。他提議對本土環境觀念進行重新考慮，認為就中國環境政策和西方對自然的理解而言，本土觀念都可能有自己的貢獻。雖然他沒有展開討

論，但通過書中對兩岸環境觀念和實踐多樣性的闡述，相信讀者已不難看出作者的立場。全球化不是以歐美觀念制度席捲世界其他地區的過程，也不是邊緣地區抵抗資本主義中心擴張的單一歷史，全球化的觀念必須經受本土文化的碰撞、抵制、吸收、揚棄，以至重塑自身，這個過程極其複雜。我們只有兼顧全球化與本土文化的影響，兼顧不同層面、不同權力節點中全球化如何實現其影響，才能得到一個更為全面的畫面。

魏樂博給讀者提供了愉快又引人深思的閱讀體驗。書中敏銳的觀察和精闢的分析俯拾皆是，不難看出他對中國和西方環境文化的深刻理解。美中不足的是以此書不到二百頁的篇幅，每每讓人有意猶未盡的感覺。雖然言簡意精是其特色，但由於書中涉及的領域和問題非常廣泛，在有些問題上，作者沒有完全展開充分論述。實際上，中國人對自然的傳統看法，西方自然觀的傳入、影響和演變，兩岸環境意識的興起，以及環境政策及實施的複雜性，每一個方面都可以成為一部學術專著的論題。魏樂博的貢獻在於指出了研究中國環境問題的一個新視野，即從文化觀念的層面着手，以求得到更本質和更深刻的理解。至於具體問題研究的細化，相信今後通過作者和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一定會有更多的收穫。

中國大陸和台灣一方面因環境污染，一方面因國際壓力，近來都制訂政策以圖保護環境，但兩地都存在政策和貫徹脫節的問題。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源於政策制訂者和受用者對自然的不同理解。

周永明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  
人類學系副教授